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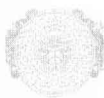
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

CHUNQIU BIFA YU
ZHONGGUO WENLUN



张金梅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

CHUNQIU BIFA YU
ZHONGGUO WENLUN



张金梅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 / 张金梅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 - 7 - 5004 - 7074 - 8

I. ①春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文学理论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I20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3836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张 林
特约编辑 蓝垂华 全太顺
责任校对 林福国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om.cn>
中文域名: 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6. 25
插 页 2
字 数 443 千字
定 价 62. 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电话: 010 - 64009791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08XZW010)鉴定结项成果

序

近现代之交，在西方强大的文化冲击下，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了一次重大转折。与中国文学理论一样，在西方文化夹带着政治、经济优势强行冲向中国之时，中国文化也被迫“大河改道”，在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声中开始告别传统文化。这种“改道”一方面是外国文化的抢滩登陆，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在优势的西方文化面前，通过一番碰撞、挣扎后，转过来向西方文化学习。我们的知识分子通过一番“论战”，逐渐认识到我们故步自封，守着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行的，要向西方学习，“别求新声于异邦”，倡导所谓“拿来主义”，于是乎，西方的文学理论开始被大规模引进。在短短一二十年间，中国文学理论几乎是“换了一个人间”，传统中国文论从主流位置退却下来，西方文论大行其道。这种“大河改道”式的转折在中国已经持续了近百年来，对中国 20 世纪文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，我们 20 世纪文论的基本样态与格局就是在这次“大河改道”中形成的。

然而，在这一个世纪之交（20 世纪至 21 世纪），中国文学理论似乎在开启着另一个转折点，这个转折甚至已经初露端倪，它将何去何从，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。我曾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，提出中国文论的“失语症”，主张“重建中国文论话语”，要求读“十三经”，背《文心雕龙》、《文赋》。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也于 1996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在陕西师范大学首次召开“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”专题学术研讨会。钱中文、霍松林、张少康、杜书瀛、陆贵山、蔡钟翔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多名文艺理论界知名学者与会，共同就如何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处境，如何看

待传统以及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，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，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的高潮。《文学评论》还组织了持续两年之久的专栏，专门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。此后，无论是古代文论研究界，还是普通文学理论研究界，无论是著名学者，还是中青年学者，都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。我们老中青三代学者，甚至包括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学者也都是如此，他们反思当前文学理论的困境，共同认识到，仅仅依赖西方文论，中国文论不可能有出路。这是一个信号！中国文学理论又一次转折的信号！这个转折，从微观上看，是在20世纪近百年文论发展的深刻教训和学术界长期反省的情况下产生的。从宏观上看，则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变迁密不可分。东方经济与政治的复兴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东方文化的复兴。也可以说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不仅仅是经济的、政治的复兴，也是民族文化的复兴。也正缘于此，现在有很多学者，包括在西方学习和工作了很久的学者，他们当年皆主张学习西方文化，现在却都开始倡导中国文化、东方文化。典型的例子如季羨林先生留德十年，他从90年代开始就重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，认为不能完全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，不能有什么“贾桂”思想。有很多人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。他曾经说过：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复兴。”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季先生是有很敏锐的眼光的。现代著名诗人郑敏当年也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骨干，现在他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也是大力倡导的。连研究西方后现代的王岳川也提出重新“发现东方”，倡导将中国文化“输出东方”。而中国文学理论的转折与建构，也必然与此同步。这种转折不是一两个人的意愿，而是一种潮流。这种潮流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，是一个学术前沿问题，也是我们国家整个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问题。如果我们处理得好，认识得清楚、深刻，那就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机遇；处理得不好，就很可能干扰我们的文化发展，干扰我们的学术研究。

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得失。今天的中国文化、文论正处在从“西化”到“化西”的转折点上。我们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“西化”历程，中国文化、文论已经到了几乎要被“西化”掉的衰弱局面。这种虚弱状态就是我所说的当今文化与文论的“失语”状态。所谓“失语”，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，而是指它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。

而话语规则又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规则，而是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。这些法则是在一定文化传统、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，是一个民族在思维、表达、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，是意义的建构方式和交流与创立知识的方式。因为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，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。所以中国的文化精神不但不同于西方，而且与同为东方文化系统的印度也有差异，中国特有的文化精神决定了中国学术思想表达中话语的特殊性。然而，当今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、现当代文学的理论框架、学术规则、学术范畴，如“内容”、“形式”、“典型性”、“文学性”、“现实主义”、“浪漫主义”、“表现主义”、“唯美主义”、“象征”、“荒诞”、“颓废”、“感伤”等都不是我们本土的，而是从西方贩来的。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可不可以呢？当然也是可以的，我们可以说李白是“浪漫主义”的、杜甫是“现实主义”的。但是这些术语和规则毕竟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，不是产生于中国的，是西方的文论话语，与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古代文论是有一定距离的。诚然，这些术语和规则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用，但是如果用得恰当，就会产生很多问题。更为严重的是，由于多年来的崇洋贬中，在西学日炽、中学日衰的当代，我们无视中国文论固有的话语规则，天天操着洋腔大谈特谈“浪漫主义”、“现实主义”、“解构主义”等，让中国的文化规则几乎丧失殆尽，中国文论、中国学术的创新能力大大降低。从“五四”迄今，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模仿、在追随，即模仿西方各种各样的文论，追随西方各种各样的理论界潮流。时至今日，这种模仿愈演愈烈，完全丧失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，丧失了民族文化的创造精神，在无止境的模仿追随之中几乎泯灭了中国的文化规则。

目前这种状态还可能有两个发展方向：一是一如既往地继续“西化”；二是将西方文化中国化。“失语症”之所以触及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发展战略问题。如果说“失语症”警醒人们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危机，那么“重建”论则正设法引导中国文化走从“西方化”到“化西方”的转变之路，逐步寻回中国文化之骨骼血脉。中国历史上已有若干次的中外文化“融汇”与文化“转换”和文化“重建”的实践。历史发展到今天，究竟怎样“转换”，怎样“重建”，怎样“融汇中西”？我们需要研究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路径来。这条路径，不应当是闭门空想出来的，这个方法，不应当是人为地设计出来

的，而应当是在总结人类文化的总体规律，总结各国文化交流规律，总结各国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。理论的建构只能提供一种话语重建的可能性，而现实的有效运用才能使一种话语按照固有的方式活起来。因此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中国文化战略，从过去近百年的“西方化”，转换到今后若干年的“化西方”，运用文化与文论“他国化”这条文化发展规律，实现以我为主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，既倡导“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”，又倡导“西方文论中国化”，真正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与重建。这是当代中国文化、文论建设新的制高点，是中国当代文化、文论的创造性工程，更是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。

在这一学术背景下，张金梅博士的《〈春秋〉笔法与中国文论》一书创新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。

首先，《〈春秋〉笔法与中国文论》在选题上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。该书首次从历史发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角度，对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关系进行了较全面、深入的研讨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作为中国文化话语的《春秋》笔法，对中国文论的话语言说方式、意义建构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所产生的重大影响。一方面开拓了前人较少涉及的领域，另一方面则在推动经学、史学、文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同时，为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”提供新的视角和背景，不但对古代文论研究有参考价值，对现代文艺学研究亦有参考意义。

其次，《〈春秋〉笔法与中国文论》在观点上也有一些创新之处。该书从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关系角度切入中国文论的研究，因而对中国文论中某些老生常谈问题能作出新的阐释，并言之成理。如对《春秋》笔法作为中国文化话语的强调，有关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的解析，“诗无达诂”的理论内涵及其与西方阐释学的比较，“《春秋》五例”与“赋比兴”关系的论述，以及从“《春秋》义法”到“古文义法”渊源流变的考察等都谈得很有新意且头头是道，体现出作者相当厚实的学术功底和较强的理论识见能力。

再次，《〈春秋〉笔法与中国文论》视野开阔，涉及面甚广。《春秋》笔法是一个富有民族特色、贯穿古今，涉及经、史、子、集和多学科的重要命题。探讨其与中国文论的关系要涉及经学、史学、文学乃至文论众多领域，把握上有相当难度，但确实又很重要。该书对所研究的对象作了充分准备，确实做到了详细地占有材料，对于历史上关于《春秋》笔法的

阐释和解析几乎网罗殆尽，博览群籍，涉猎极广。该书对于古人观点的梳理也甚为到位，一是理清其发展的历史脉络，一是解剖其含义的不同层次，可谓鞭辟入里，阐幽析微，罗列清疏，概括完整而有系统，阐说清晰而有深度，表现了一定的学术探索的勇气。

对“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”和“西方文论中国化”的研究，是一项长期、艰巨的浩大工程。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还需要更多有才华、有志气的学者投入到这一学业中来。就是这本《〈春秋〉笔法与中国文论》本身，也还存在着可以进一步发展、完善和争议的地方。

祝愿金梅再接再厉，在“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”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！

曹顺庆

2012年4月于川大花园

目 录

序	(1)
绪论 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研究场域	(1)
一 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课题的学理依据	(1)
二 《春秋》笔法、中国文论释名	(4)
三 近30年国内外《春秋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	(10)
四 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课题的入思理路和研究方法	(27)
第一章 《春秋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	(30)
第一节 《春秋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历史渊薮	(30)
一 从“百国春秋”到孔子《春秋》	(31)
二 孔子《春秋》笔法的基本内涵	(40)
第二节 《春秋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基本内涵(一):《春秋》书例	(45)
一 《左传》:因“本事”昭示《春秋》书例	(47)
二 杜预:借《左传》总结“三体五例”	(52)
第三节 《春秋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基本内涵(二):微言大义	(66)
一 “借事明义”之“微言”	(67)
二 “正名为本”之“大义”	(76)
第四节 《春秋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基本内涵(三):史家笔法	(89)
一 史笔:“实录”、曲笔	(89)
二 史用:“名教”、褒贬	(101)
第五节 《春秋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内在质因	(114)

一	“征圣宗经”	(115)
二	“依经立义”	(120)
第二章	《春秋》笔法与诗史关系	(127)
第一节	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何谓	(127)
一	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”何谓	(128)
二	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何谓	(135)
三	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的象征意义	(140)
第二节	“史蕴诗心”	(145)
一	“史之称美者,以叙事为先”	(145)
二	“作史贵知其意”	(151)
第三节	“属辞比事”:诗史《春秋》笔	(156)
一	“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教也”何谓	(157)
二	“属辞比事”:中国文章学创作方法论	(163)
三	“诗史《春秋》笔”:以杜甫为例	(169)
第三章	“《春秋》无达辞”与中国阐释学	(176)
第一节	“《春秋》无达辞”何谓	(177)
一	有“常辞”无“通辞”	(178)
二	“微言”、“微辞”	(184)
三	“微旨”、“大义”	(188)
第二节	“《诗》无达诂,《易》无达占,《春秋》无达辞”	(193)
一	“《诗》无达诂,《易》无达占,《春秋》无达辞”的历史语境	(194)
二	“《诗》无达诂,《易》无达占,《春秋》无达辞”的阐释实践	(202)
三	“《诗》无达诂,《易》无达占,《春秋》无达辞”的理论意义	(206)
第三节	“《春秋》无达辞”与“《诗》无达诂”	(214)
一	“断章取义”:“《春秋》无通义”与“《诗》无达诂”	(215)
二	“从变从义”:“微言大义”与“定向阐释”	(220)
三	释义方式:“察外见内”与“以意逆志”	(226)
第四节	从“《诗》无达诂”到“诗无达诂”	(233)
一	从“《诗》无达诂”到“诗无达诂”的历史流变	(233)
二	“诗无达诂”的理论内涵(上):“从变”	(241)

三	“诗无达诂”的理论内涵(下):“从义”	(250)
四	“诗无达诂”与西方阐释学	(255)
第四章	“《春秋》五例”与中国文论话语	(259)
第一节	“《春秋》五例”与“赋比兴”	(259)
一	赋:“尽而不汙”	(260)
二	比兴:“微而显”、“志而晦”、“婉而成章”	(263)
第二节	“尚简用晦”与简约含蓄	(272)
一	“简言以达旨”	(273)
二	“隐义以藏用”	(277)
第三节	“《春秋》五例”与评论话语	(290)
一	“微而显”作为诗评话语	(292)
二	“婉而成章”作为诗评话语	(296)
三	“《春秋》五例”作为诗评话语	(300)
第四节	“怨恶而劝善”与中国文学伦理化	(304)
一	诗:“主文而谲谏”	(305)
二	赋:“劝百而讽一”	(310)
三	戏曲小说伦理论	(314)
第五章	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学批评	(324)
第一节	《春秋》笔法与小说评点	(325)
一	直接以《春秋》笔法相比况	(325)
二	“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迂”	(329)
三	曲笔褒贬与史家笔法之融通	(333)
第二节	《春秋》笔法与索隐批评	(339)
一	从索隐到索隐派	(339)
二	索隐方法与《春秋》笔法之融通	(344)
第三节	“《春秋》义法”与“义法批评”	(349)
一	从“《春秋》义法”到“古文学义法”	(349)
二	“义法批评”	(354)
三	“义法批评”与“《春秋》义法”之融通	(360)
四	余论	(364)

第六章 《春秋》笔法的现代意义	(366)
第一节 《春秋》笔法与文学精神	(366)
一 直接借用	(367)
二 间接活用	(368)
第二节 《春秋》笔法与新闻精神	(374)
一 客观报导	(375)
二 新闻写作	(378)
第三节 《春秋》笔法与人文精神	(382)
一 政治斗争	(383)
二 广告策划	(384)
三 日常生活	(387)
结语 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会通化成	(391)
一 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相互吸纳和中国文论的宗经意识	(392)
二 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彼此融汇和中国文论的诗史精神	(395)
三 《春秋》无达辞与阐释学交互影响和中国文论的诠释 方式	(396)
四 《春秋》五例与文论话语交相渗透和中国文论的 价值系统	(398)
五 《春秋》笔法与文学批评双向会通和中国文论的 批评模式	(399)
主要参考书目	(401)
后记	(407)

绪 论

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研究场域

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说过：“‘五四’运动以前两千多年里面，所谓学问，几乎专指经学而言。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，著述以敷衍圣旨为贵，派别繁杂，训解浩瀚。”^①作为学术的指导思想，经学的派别规约着学术界的各个学派，因之，中国古代文论也逃脱不了经学的影响。

一 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课题的学理依据

经学系指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。自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经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正统，直到“五四”运动摧毁封建文化，经学才始告终结。当代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在为皮锡瑞先生《经学历史》一书作序时，曾将其划分为三派，即“西汉今文学”、“东汉古文学”和“宋学”，并对其各自的学术特征进行了概括：“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，以‘六经’为孔子致治之说，所以偏重于‘微言大义’，其特色为功利的，而其流弊为狂妄。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，以‘六经’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，所以偏重于‘名物训诂’，其特色为考证的，而其流弊为烦琐。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，以‘六经’为孔子载道之具，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，其特色为玄想的，而其流弊为空疏。总之，三派固

^① 范文澜：《中国经学史的演变（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）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《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265页。

各有其缺点，亦有其优点。”^①而“六经”之一的《春秋》亦在今文家、古文家及宋学家的推衍、阐释下，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巩固、发展和延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，并对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艺术等各学术部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孔子修《春秋》是一种自古以来就非常流行的看法。那么，孔子是如何作《春秋》的，其目的和意义何在？便成为历代学者们解读《春秋》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，而这也正是人们常说的《春秋》笔法的具体内容。一方面，尽管这种《春秋》笔法之说属于经学命题或史学命题，但由于《诗经》和《春秋》的特殊关系，如《孟子·离娄下》所谓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，其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，却不在许多纯文学命题之下，值得作专门探讨。

另一方面，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文史哲并非泾渭分明。如刘歆《七略》、班固《艺文志》都未设史部，而将古代以及秦汉的史书附于《春秋》之末，直至晋荀勖始分四部，“经”、“史”、“子”、“集”才渐次独立。^②但“经”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，仍然会渗透到“史”、“子”、“集”中，而“六经皆史”的论说更将“经”和“史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如王守仁说：“以事言谓之史，以道言谓之经。事即道，道即事。《春秋》亦经，《五经》亦史，《易》是包牺氏之史，《书》是尧、舜以下史，《礼》、《乐》是三代史：其事同，其道同。安有所谓异？”^③李贽亦云：“经史一物也。史而不经，则为秽史矣，何以垂戒鉴乎？经而不史，则为说白话矣，何以彰事实乎？故《春秋》一经，春秋一时之史也。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，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。而《易经》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，史之所从来，为道屡迁，变易匪常，不可以一定执也。故谓‘六

^① 周予同：《经学历史·序言》，（清）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—4页。

^② 《汉艺文志考证》云：“历代国史皆其流出于《春秋》。刘歆叙《七略》，王俭撰《七志》，《史记》以下，皆附《春秋》。荀勖分四部，史记旧事入丙部，阮孝绪《七录》，记传录纪史传由是经与史分。”参见（宋）王应麟《汉艺文志考证》，卷三，《春秋》“《楚汉春秋》九篇”条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按荀勖分书籍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：甲部（六艺，小学）、乙部（诸子兵书，术学）、丙部（史记及其他记载）、丁部（诗赋图赞）。隋唐以后经籍艺文分类，多用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为序，亦作群书的通称。

^③ （明）王阳明：《王阳明全集》，卷一，《语录一·传习录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0页。

经’皆史可也。”^①而史学专著谈文，文学专著论史亦在实践和理论上将“史”和“集”紧密地纠结在一起。

从实践上看，中国文学批评的展开与史学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如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家传记就是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。在此一《列传》中，司马迁长篇摘录了屈原的《渔父》、《怀沙》；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、《鹏鸟赋》，这说明司马迁是把他们作为辞赋家而立传的。其后班固《汉书》设《司马相如传》、《扬雄传》，例同《史记》。而范曄《后汉书》则于史传中专设《文苑传》，将文学家作为历史人物中的某一特殊群体加以记载，后世著史亦相沿不改。^②与正史《文苑传》或《文学传》为文学家立传的做法相反，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还出现过专为文学家著小“史”的现象。如元好问编有《中州集》，选录金代二百一十七人的诗作，集中每人各有一小传。元好问于金亡后本以著史自任，曾记录金代君臣言行凡百余万言，故编《中州集》也有以诗存人，以人存史之意。宋人家铉翁曾指出：“南北名人节士巨儒达官所为诗，与其平生出处，大致皆采录不遗。”^③其后元代辛文房搜罗唐代二百七十八家诗人事迹为《唐才子传》，自序称：“撰拟成篇，斑斑有据，以悉全时之盛，用成一家之言，各冠以时，定为先后，远陪公议，谁得而诬也。”^④明清之际钱谦益编著《列朝诗集》，亦于集前为每一诗人附作小传，自称“余撰此集，仿元好问《中州》故事，用为正史发端，搜摭考订，颇有次第”^⑤，表现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和认真求实的史学家态度。

从理论上，文论家论史、史论家论文在文学批评史和史学批评史上也十分常见。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集文体论研究之大成的《文心雕龙》就将《史传》列为文学一体。萧统《文选》虽主要以“集”为主，但出于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的考虑又选录了“史”中的“赞论”、

①（明）李贽：《焚书》（全五册），卷五，《读史·经史相为表里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593—594页。

②个别例外，如宋濂修《元史》，合文苑与儒林为一，称之为“儒学”。

③（宋）家铉翁：《题中州诗集后》，《遗山先生文集附录》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。

④傅璇琮：《唐才子传校笺》（第一册）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2页。

⑤（清）钱谦益：《列朝诗集》，甲集第十，徐布政贲，《神弦曲》评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22页。

“序述”。此后刘知几的史论专著《史通》也有文论，刘熙载的文论专著《艺概》亦有史论，而章学诚的学术论著《文史通义》则兼综文论与史论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经学话语、史学话语与文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相通的。也正缘于此，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史学、中国文学、文论相融相通才具有言说的价值和意义。

二 《春秋》笔法、中国文论释名

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”^①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也曾说过：“在任何稍微精确的研究中，不管它的对象是什么，一定要依据严格地下了定义的术语。”^②本论文既以“《春秋》笔法与中国文论”为题，因此，在展开论析之前，对《春秋》笔法和中国文论的阐述、界定，就成为必要的、不可回避的问题了。

（一）《春秋》笔法

《春秋》笔法亦可称为“《春秋》书法”、“书例”、“义例”、“凡例”、“义法”等。关于《春秋》笔法的定义，现代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。一种以周振甫为代表，他在《春秋笔法》一文中开篇指出：

《春秋》本是先秦时代的编年史，因为每年记上春夏秋冬四季，所以省称《春秋》。后来孔子根据鲁国的《春秋》加以修订，也称为《春秋》。因此春秋笔法有两个含义：一指历史书的笔法，一指孔子修订的《春秋》的笔法。……《春秋》以前的鲁国历史书的笔法虽然无从考查，《春秋》以后的各种历史书的笔法却是可以研讨的。因此，春秋笔法既指孔子修订的《春秋》笔法，也指《春秋》以后的各种历史书的笔法。^③

① 程树德：《论语集释·子路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886页、第892页。

② [俄]普列汉诺夫：《没有地址的信·艺术与社会生活》，曹葆华等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，第3页。

③ 周振甫、冯其庸等：《古代作家写作技巧漫谈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页。